

担保业震荡样本：鑫信担保的煎熬与焦灼

■ 卢伟 报道

“我这算是从天堂到地狱了吧？”南京鑫信担保集团(下称“鑫信担保”)董事长付树兵对记者说起自己的经历,圆脸上依然有习惯性的笑容,但一个接一个的电话,却不断透露出他的煎熬和焦灼。

鑫信担保是南京最大的民营担保公司,几年前高峰期年对外担保总额近40亿。如今,随着“4万亿政策”的退潮和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其数百家客户纷纷陷入困境,有多家企业破产倒闭或者老板跑路。

三年来,付树兵的客户中有十几人死亡、30多人跑路。鑫信担保不断替客户还贷,在付出近4亿元现金后,如今也被拖入了资金枯竭的困境,接近200人的企业只剩下7名员工。

付树兵告诉记者,鑫信担保一倒,可能会有600家企业受连累。

一年多代偿近4亿元

按照几年前的设想,鑫信担保如今应该在自己的总部大厦办公。这栋大楼设计为18层,位于南京高端写字楼密集的河西板块。高峰期,鑫信担保为600多家企业作担保,年对外担保总额近40亿。

南京市担保行业协会的资料显示,截至2012年3月末,该市融资性担保机构91家,其中南京富登投资信用担保公司注册资本最大(178亿元、外资),鑫信担保和中融信佳融资担保公司注册资本位列其后(皆为3亿元)。

如今,这一切光荣与梦想,已经雨打风吹去。当年准备建楼的地块,已经卖掉,连付树兵的奔驰车也已经卖掉。

在这背后,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担保行业的“过山车式”的震荡。

2011年下半年开始,“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退潮,随着货币政策收缩和宏观经济下行,大量的中小企业坏账爆发。担保公司是介于企业与银行之间的防波堤,企业一倒下,压力便冲向防波堤。各地老板跑路,担保公司陷入困境的事件开始频频发生。

2012年2月,受京广两地相继爆发的中担、华鼎、创富三家担保公司违规事件影响,绝大多数民营担保机构的业务被商业银行“一刀切”,进而导致全行业业务量急剧萎缩。

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门联席会议数据显示,在北京、广东、浙江等担保机构较多的地区,新增融资担保额首现负增长。代偿方面,截至2012年末,全国担保代偿余额250亿元,代偿率为1.3%。而2011年全国担保机构代偿率平均为0.42%,2010年仅为0.16%。

这一波巨浪冲击,鑫信担保也不能幸免。付树兵告诉记者,自2011年8月至2012年年底,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鑫信担保已经为客户代偿近4亿元。

付树兵说,2012年春节以来的日子,是他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时光,几乎隔三差



五就接到所担保的中小型企业负责人跑路失踪的消息。他没有一天能睡个安稳觉。

足生堂老板跳海自杀被救起、饰家装饰老板割腕自杀被救活、红木家具厂资金链断裂、力王起重机厂老板意外死亡……三年来,付树兵的客户中有十几人死亡、30多人跑路,陷入困境而强撑着的则以百计。“只要对方电话一关机,十有八九要坏事。”他说,“我这算是从天堂到地狱吧?但我还得活下去啊!我父母我妹妹的房子财产也都抵押进去了。但是心态要放平淡,以前辉煌,现在无非是到平地上了。要没这个心态,我可能死得比他们(客户)都早。”

银行的角色

付树兵总结说,他的客户倒下的原因,除个别是因为企业老板吃喝嫖赌导致企业“非正常死亡”外,原因一是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导致的企业倒闭或被关闭;二是“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退潮,导致不少扩张中企业的资金链断裂;三是企业互保,坏的连累了好的;四是司法系统运行效率低下,导致企业之间的债务清算极为缓慢,拖垮了不少企业。

2013年底,记者来到南京溧水博瑞特工艺品公司。五层楼的厂房崭新明亮,但却已经空空荡荡。该公司原来有近200名职工,年销售额在5000万元左右,2012年时还在盈利,但最终被一口气憋住,资金链断裂倒地。

该公司负责人吴某原是当地的成功人士,多年来专注搞实业,也没什么不良嗜好。但企业所受的打击,几乎将他的精神摧毁。“我都打听了哪儿能买肾。”他一边说着,落下泪来。临近中午,他捏着口袋里仅有的几百元钱,邀请记者吃午饭,记者不忍而婉谢。

吴总告诉记者,2009年,“4万亿”计划出台后,多家银行找上门来。有银行当时发放贷款1600万。2011年夏天,这笔款项被收回,不再续贷。

而此时,吴总正在着手建设新的工厂大楼,同时投资了一个农业项目,数千万元的资金沉淀其中。在其他银行采取类似做法后,吴某顿感资金吃紧,只好左右腾挪。

吴某告诉记者,当时一家大型国有银行的负责人说,只要先把款还上,之后马上可以续贷。但他好不容易凑齐了钱还上之后,银行却食言了,说必须重新找一家国有担保公司担保方可续贷。贷款由此断掉。

被银行抽贷的企业比比皆是。南京江宁区一家矿业企业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忍不住怒斥:“银行钱多了就来动员企业贷款,钱少了就收回,根本不管企业死活。银行往往是坚持有利于己的连带责任保证方式,这样就使担保的风险完全集中到担保机构,实际上变相加大了金融风险,同时减弱了担保机构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能力。”

企业难做,越来越多的客户倒下,担保公司也遭池鱼之殃。

南京市金融办此前的一份文件分析称,与银行比,担保机构处于绝对弱势。在担保风险的分担上,银行往往只要求权利而不愿意承担义务,即要求担保机构承担100%的风险;在保证方式的选择上,银行往往是坚持有利于己的连带责任保证方式,这样就使担保的风险完全集中到担保机构,实际上变相加大了金融风险,同时减弱了担保机构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能力。

但在坏账压顶的生死关头,担保公司也会“绝地反击”:2013年年底,鑫信担保起草了一封举报信,直指曾经的合作银行存在违法行为,却将风险转嫁给自己。

该举报信列举了5起案例,其中1起涉及南京洲洋建设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高跃案。举报信称,2011年1月王高跃已经涉入刑事案件,而银行在2011年4月仍对其放款500万,且“此客户是银行高层推荐并要求担保公司担保的”。此后,鑫信担保于2012年代偿该款项。

在付树兵看来,银行最大的问题在于一旦发现风险苗头,第一反应就是抽回贷

款,把企业抽死也在所不惜,根本不考虑这个企业是否可能有效,是否只要通过努力就能渡过难关,或者实现重组。

百余案件积压法院

处置资产,往往会面临着巨大的折价。付树兵告诉记者,在南京高淳,有一处规模比较大的酒店抵债给他,当时价值超过1000万。现在为了获得周转资金,他只能忍痛逾400万卖掉。

资产折价,原本是市场经济中的正常情况,此时此地则体现为流动性折价。付树兵虽然有些痛惜,但并不苦恼。真正使他陷入巨大苦闷的,是百余案件积压在法院,资金流动不起来。

企业倒闭之后,一般是担保公司先向银行代偿企业贷款,然后担保公司向法院进一步向企业或企业主追偿。2011-2012年期间,鑫信担保已经有超过100个案件在法院立案。但案件审理进程非常缓慢,形成了巨量资金的沉淀。目前通过法院强制执行回来的只有200多万元;双方自行调解,又去法院办理交接手续的有500万-600万元。这跟近4亿的垫付资金形成了巨大反差。

“总的来看法律成本太高,达到标的额的15%-20%。现在进程缓慢,有的还没有审理,有的审理了也得不到执行。”付树兵说。

如南京华立发出租车服务有限公司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2012年12月18日终审判决,但时至今日,华立借款本金及违约金共1000多万仍未获执行。

“鑫信担保的自身运营包括风控本来没太大问题,但是司法进程太缓慢把我拖死了。我已经代偿了4个亿,目前沉淀在法院那么多,哪怕一半能追回来也有2个亿,我的公司还能运转。但现在呢?鑫信一倒,600家企业受连累。如果按照平均3家联保来计算,将会波及1800家企业。这背后是多少个家庭?”

担保业风险暗流涌动

■ 曾会生 报道

“再等五天吧,我希望担保公司的代偿资金能如期到位。”徐先生是一位普通投资人,他去年购买的融典投资公司的龙鼎系基础设施建设基金已确定违约,该有限合伙基金由中商财富融资担保公司提供担保,目前进入担保公司代偿程序。徐先生告诉记者:“担保公司应于1月20日前确保回款不少于1亿元,这是在1月10日投资人大会上决议通过的。”

如果这笔钱不到位,接下来该怎么办?徐先生说:“坦白地讲,我不知道。”

如果出现大规模代偿,担保公司会怎样?亏损?还是破产?担保公司人士说:“影响远不止于此。”

以去年发生的一起担保代偿事件为例,中投保钢贸融资担保业务,扣除减值准备后的应收代位追偿款净额为17.28亿元,最终损失量还取决于诉讼情况以及该公司反担保抵押物的变现情况。针对这笔钢贸融资担保业务代偿,中金公司研报分析称,由于涉及代偿金额较大,可能导致公司净资产规模下降,而且在担保放大倍数已经较高的情况下,公司整体抗风险能力也可能降低。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经济尚未企稳之时,企业经营风险仍然较大,担保机构代偿事件屡有发生,代偿率普遍存在上升的风险。银监会融资担保部的数据也显示担保代偿率呈现上升趋势。截至2012年末,担保代偿余额250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80.0%,代偿率为1.3%,较上年末增加0.9个百分点;2013年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融资性担保贷款代偿金额115.7亿元,与2012年上半年的70.5亿元和下半年的107.3亿元分别增加45.2亿元和8.4亿元。融资担保部负责人表示,去年经济形势逐渐有企稳迹象,不少企业已度过经营最困难时期,融资性担保贷款代偿增速开始放缓,但代偿金额仍较高,融资性担保机构代偿压力仍然较大。另外,融资性担保不良贷款余额大幅增长,不良贷款率快速上升。截至2013年6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融资性担保不良贷款余额348亿元,比年初增加160亿元,增长84.5%,高于融资性担保贷款增速78.4个百分点。融资性担保贷款不良率为2.24%,比年初增加0.95个百分点。融资性担保贷款不良率反超各项贷款不良率0.67个百分点。随着代偿压力加大,部分融资性担保机构代偿意愿下降。6月末应承担保代偿责任余额300亿元,比年初增加96亿元,增长了47.4%。

从行业角度来看,“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只要有一个担保机构出现相当规模的代偿损失或者是发生一些连带的债务问题,就会给整个行业带来影响和损失。”一位担保行业资深人士说,“出了事,大家总是把担保‘一棒子打死’,就拿代偿来说,如果担保公司代偿意愿转弱,甚至是发生部分担保悬空,再或者是部分担保机构因经营违规或业务异化造成代偿能力下降,行业整体信誉度就会下降,对我们了解的老客户还好,主要是开拓新业务就比较难了。”

行业整体形象受损,潜在客户认知不足,代偿压力增大,银担合作又受限,部分正规担保机构开展业务也受到限制,甚至是主动减少融资性担保业务——这正是让担保业界担忧的事情。

经营何以为继?每个担保机构都必须面对这一严峻挑战。“担保行业目前整体的经营和生存压力仍然比较大,全国近万家担保公司中有实际担保业务的可能不足一半。”中合担保总经理周纪安告诉记者。融资担保部资料显示,2013年上半年,融资性担保贷款户数和余额在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中的占比均有所下降,分别为9.92%和2.2%,比年初下降5.8%和1.6%,显示与各项贷款增速相比,融资性担保贷款相对增速放缓。

周纪安认为,担保行业经过近20年的发展,这个行业面临结构调整的问题。从整个行业看分化趋势更加明显,担保公司集体步入转型时期,部分担保公司采用多元化经营,弥补主业经营困难带来的压力和亏损,转向小贷、典当及其他业务,还有一些大中型担保公司正在依靠增资,特别是借助地方财政增资“往上走”。

事实上,越来越多担保公司热衷于通过“增资”来提升资本实力。根据中金公司对近年来有可比数据的17家债券市场主要担保公司的研究来看,来自盈利积累的净资产增长对担保公司资本实力的贡献明显较低,“实收资本增加的发行人占比过半,虽然体现了股东支持,但另一方面说明净资产在净资产增长中的贡献很大,而盈利的贡献较小,说明依靠自身担保业务经营实现资本实力的增强非常困难”。2012年,在其研究的17家样本公司中,11家注册资本有所增长,其中首创担保、中关村担保和深圳中小担保当年注册资本均有翻倍增长,其余8家担保公司资本实力也有增强,体现了股东的支持力度较大。

另外,还有些担保公司通过资产运作盈利的压力较大,这样一来,如果风控不力,就可能出现较大的投资风险。中金公司研报分析认为,由于担保业务规模普遍较小,盈利状况不佳,担保公司难以依靠自身业务盈利实现资本扩张,运用资本投资获取收益成为许多担保公司生存的重要基石,但这带来一个重要问题,即高风险投资、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普遍,甚至出现股东抽逃注册资金,严重损害担保公司代偿能力。

清理担保业 期待顶层设计

“担保业没有金融许可证,没有办法进入同业市场,在整个金融领域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某大型合资担保公司的员工张军在对记者介绍自己所从事的行业时这样说。在张军看来,融资性担保公司和非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区别仅仅在于,一个是“正规军”,一个是“游击队”,由于在工商登记时明确地标出融资性担保公司,因此必须要接受地方金融办或者金融监管局的监管。

不过,所谓的监管也更多是形式上的,专业度很低,也不太去抓管理,不看企业的报表和数字,担保公司只需要报备季度和年度的担保额和投资情况即可,与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行业相比,这样的监管显得过于粗放。

另外,目前银监会联合各部委制定的规范担保行业制度在层次上属于部门规章,法律位阶较低,而专门的法律远未制定。“国家对担保公司顶层设计不好,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方培林对记者表示,除了监管不足和法规缺位之外,担保制度也存在很多值得改进之处。

“假如我是融资性担保公司,在国内只能扩大5倍,不挣钱;在国外,可以扩大到20倍、30倍,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国外的担保公司是和银行共同承担风险,国内就只有担保公司。第三,假如我是融资性担保公司,除保证金外,我还有一个亿的大楼,没有抵押,能不能允许扩大规模?按说也可以达到担保的目的,但是由于流动性差,需要拍卖,目前不行。现在不能用实物,应该改革。”前方兴钱庄创办者、温州方兴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培林说。

(国培机构)

银行断粮后的拐点

■ 周宇 报道

近日,记者获悉,广东银达担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广东银达”)已完成新一轮增资,其注册资本金从7.8亿元增加到10.4亿元。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注册资本金达到10亿元以上的担保公司仅50家左右,其中八成以上都是国资担保公司,而民营的则不到10家。银达本轮完成增资将成为广东首家注册资本金达到10亿元的民营担保公司。

“华创事件”的爆发使得盛极一时的广东担保行业迅速衰竭,业内人士指出,其中关键原因在于银行的“断粮”。

广东省担保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6月,全省(深圳除外)新增担保额同比下降67%,仅五成的担保公司仍在开展业务。

而根据广州市金融办的数据,目前广州90余家融资性担保公司中,已退出市场的共计20家,占比约两成。广东合润融资担保公司总经理古国红表示,估计目前广州市场上真正在做(新增)业务的融资性估计就5-6家。

而据记者调查,市场上无法开展新增业务的担保公司,部分在靠存量业务维持生存。一位业内人士说:“消化完存量业务后,若银行仍不开闸,也



只好退出市场。”其中,这些无业务的公司不少已在悄悄转型,比如为银行拉客,或者为客户提供财务支持,以获得银行贷款;还有的则在地下市场做资金拆借。

虽然大部分担保公司被“断粮”,但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却仍然旺盛。在难以通过担保公司获得银行信贷后,不少中小企业通过小贷公司甚至民间借贷进行融资,这实质上提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据了解,目前中小企业通过银行直接融资成本在7%左右,而通过担保融资的话,加上保费总成本仍能控制在10%以内,但小贷、地下市场等融资渠道的成本则要达到20%以上。

广州茶叶市场经营普洱茶和红茶的张先生说:“通过担保公司做质押贷款,融资成本相较于过去的私人拆借下降很多,融资金额则更大,这对我们的原

材料收购、企业发展都非常关键。”

继佛山集成首赴香港上市后,银达的逆市增资也被业内视为是龙头企业走出行业“寒冬”的信心。资深担保行业人士表示,今年或迎来行业拐点。

李思聪说:“担保是跟着宏观经济周期走的,未来三到五年看好经济回暖,所以担保业的春天会来临。”他认为,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层面对民营经济管理模式发生了变化,而2012年、2013年整个行业洗牌中淘汰掉不少低端,产能过剩的产业后,经济结构会有所优化。

与此同时,不少业内人士也感觉到监管层态度已较为明朗,在支持小微金融的大政策环境下,监管层对于担保行业的方向已从“整顿规范”转向“扶持”。

目前,业内人士认为,担保业的发展趋势将以综合化和专业化为主。工信部中小企业司司长狄娜在广东省信用担保协会常务理事会上就表示:“(做担保)要有金融控股集团的概念,实现机构全功能、企业全周期,要适合市场,根据企业周期配于不同的融资方式。”

广州市融资担保中心总经理江日华认为,制度性障碍一旦破除,作为整顿重点区域的广东担保行业必将迎来大发展的良好时机。